

大众周末

■ 新闻关注



穆斯林女孩 混搭日本“萝莉风”

近来，英美出现结合日系萝莉风格的穆斯林服装。穿着这些服装的女孩虽颠覆传统，但还是谨守伊斯兰文化，头发、耳朵、肢体都包裹在衣服下，一丝不露。



牛人 冲浪板上秀体操

近日，夏威夷海滩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双人冲浪比赛秀。一对牛人比赛中将体操和冲浪完美结合在了一起，用各种超乎想象的板上高难度托举动作赢得满堂喝彩。



缅甸记者洪水中 坚持播报灾情

近日缅甸大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暴雨，超过15万民众受灾。8月2日，当地一名男记者，为实时播报洪水有关消息，水到脖子口仍坚持报道灾情。



跨物种做朋友 猕猴与蜥蜴亲密

德国一名摄影师拍到了一只绿色蜥蜴和一只猕猴亲密无比的照片。该摄影师对这种动物界跨物种朋友早有耳闻。经过长时间的守候，终于拍到了关键的一刻。

■ 周末人物 英雄儿女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

由于汉奸出卖，鬼子把周振苍绑到小枣树上，拿刺刀刺死。方兰亭毅然接替丈夫传递党的情报，并担任了四县边联委会妇女会长。1940年冬，四县遭灾，方兰亭看到战士吃糠咽菜，心里难受。“俺娘就打听到一家人很富有，但是没孩子，就把我抱到她家，要了20斤谷子。回家轧好谷子，做好小米稀饭，给战士们吃。”当年被“卖”的周庆兰回忆说，战士们知道真相后抱头痛哭，凑钱把她赎了回来。

“周大娘” 舍女换谷助八路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

周庆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。

8月1日，在兰陵县县城北15里外的东盘石沟村，大蒜收获时的特殊味道弥漫开来。几位老者坐在路边闲谈，当记者问起“是否认识方兰亭”时，他们摇头说不知。等记者再问，“是否认识打鬼子的‘周大娘’或‘周会长’”时，老人们纷纷站起，凑过来，谈起“周大娘”的各种传奇故事。

孩子是革命的火种

其实，这“周大娘”“周会长”都是一个人，她叫“方兰亭”。她的旧居遗址在东盘石沟村北部。旧居西邻，是一条小溪，其中横卧数块磐石。每年雨季来临时，溪满沟平，黄水拍石，百年不变。

如果没有日寇引燃的战争，方兰亭的人生次序，会在这个鲁南小乡村次第展开。

生于1891年的方兰亭，家中兄弟姊妹8个，家境清贫。自幼懂事的她，陪爷爷在峰园里养蜂。母亲给她裹脚，干活时她嫌疼，就悄悄解开，等回家再缠起来。爷爷很疼爱她，割了蜂蜜先给她吃。她在前面拉着小木轮车，陪爷爷去50里外的沂州府卖蜂蜜，看城里的风土人情。

“三寸金莲”没缠住，直到21岁时，方兰亭才嫁给东盘石沟的周振苍。这周家本来家境富裕，周振苍的爷爷带六个儿子上山开荒，开出一篓子银元宝。一个暴富的周家人，不忘行善，给村里修庙、修桥、修学校，之后开始置地，每个儿子二三十亩。结果，富不过三代，到周振苍时，家中仅有两亩薄地。

清末民初的鲁南地区，旱涝、蝗灾连年不断，土匪多如牛毛，兵匪猖獗，鱼肉乡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周振苍夫妇勤劳吃苦，还有一个男孩，日子越趟越起地朝前走着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周家这男孩，不到三岁就夭折了。这时恰巧土匪来周家打劫，将家中农具、粮食、被子统统抢走，连周振苍也掳走了。方兰亭别无他法，去找周家的兄弟凑钱，将丈夫赎回。

一气之下，心灰丧气之痛的周振苍闻东北去了。他在东北挖煤、砍树，待了五年，勉强温饱。周振苍牵挂家中亲人，就坐上拉煤的火车返乡。路上遇到一个教书先生叫郭云舫。在半个月的旅途中，郭云舫见周振苍是老实厚道的穷苦农民，便向他讲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新鲜事。

1931年，周振苍回家后，把路上的见闻讲给妻子方兰亭。郭云舫也经常来周家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。方兰亭最开始以为，共产党是一个，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人为咱穷人说话。

在郭云舫润物无声的教育下，周振苍和方兰亭的思想逐渐开悟。1933年春，中国共产党在鲁南地区的党组织，计划以苍山作为立足之地，迅速聚集千余人的武装队伍，然后转移到抱犊崮山区建立根据地。

暴动前夕，郭云舫叫人制作暴动大旗、红旗白字，当中是锄头、镰刀黄色插图。他还到周振苍家，嘱咐道：“带几个人去苍山！”周振苍带上妻子，背上干粮，匆匆向苍山赶去。等走到半路，见有些人神色紧张向回跑。机警的方兰亭劝丈夫打昕一下再走，不多时，一个熟人跑着对他们说：“暴动失败了，现在国民党到处抓人，赶快藏起来。”

方兰亭和丈夫匆匆撤回家中。由于身份没有暴露，方兰亭家仍是共产党秘密交通站，她常常帮助丈夫完成交通站的工作任务。那时的情报传递，都是单线联系，党组织经常传递给周振苍一张卷起的小纸条。

周振苍装作赶集去卖糠，一般买糠人会问“你这个糠多少钱”，而情报接收人却以“你下一次逢集来不？”为暗号。一旦对上号，周振苍便从烟袋锅里拿出纸条，放到糠里，那人伸手去试探探，趁机将纸条拿走。

工作时间长了，党组织信任他们夫妻。1937年，党组织通知周振苍夫妇，说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。当时，这对夫妻除了种地，还做些小买卖。周振苍种菜、打火烧，方兰亭做鞋、做豆腐。他们虽然都不识字，但心肠好，做买卖朝外除账也不记，走街串巷，熟悉了周围村镇的地理环境，在村庄百姓中也颇有口碑。

1937年底，46岁的方兰亭生了第三个孩子。“当时俺娘年纪很大了，在农村这个岁数还生孩子，她觉得很丢人。俺爹很喜欢孩子，说这是革命的火种，就留了下来。”方兰亭所生的孩子是个姑娘，小名“小兰”，大名周庆兰，7月28日，记者辗转联系上她。



1951年，周庆兰与母亲的合影。

跟共产党干才是出路

1938年春，日军逼进临沂。临邞费峰四县边联成立办事处，方兰亭参加了民运部工作，成为当时促进会的主要负责人。

当时，方兰亭主要在车辆一带活动。当地民众抗日热情很高，她带领四个年轻党员去一个地主家，宣传抗日。“当天晚上就住在地主后院的柴房里，我母亲守在门口。快天亮时，她看到墙上一个个黑影在晃动，原来是被人出卖了。她迅速把年轻同志喊起来，让他们赶紧跑。其中一位小王同志，才十六七岁，好几天没睡过好觉，就脱了衣服睡。等到他穿好衣服，已经晚了，被汉奸抓住。最后，被挖眼，割舌头，挖心脏。太惨了。”周庆兰年轻时常听到母亲回忆旧事。

1938年12月，八路军第115师主力部队相继挺进山东，打开了山东抗战的新局面。1939年秋，老地下党马图瑞将一个写有重要情报的纸条，让周振苍送给115师的首长罗荣桓。“俺爹那时候犯了疟疾，就让俺娘去送。她不分白天黑夜地跑，过了一条大河，整个裹腿湿透了，等见到罗荣桓时，已经全干了。”周庆兰说。

正当方兰亭匆匆赶路时，汉奸把周振苍出卖了。“日本鬼子带着汉奸闯到俺家，把俺爹抓起来，逼问纸条的下落。俺爹骨头硬，啥也不说。最后，敌人把他绑到小枣树上。敌人用炮弹壳、枪壳子打俺爹，还威胁道：不说就割下他的头。最后，鬼子拿刺刀将他刺死。当时俺爹穿了一件白粗布褂子，被血水染成红色。”说起记忆中模糊的父亲，周庆兰依然哽咽。

“叔叔大爷把俺爹身上的血擦干，把尸体放在堂屋的床上。俺娘回来一看，二话不说，就把父亲安葬了，抱着我，领着二姐，走出了这个村子。”周庆兰介绍道。

丈夫牺牲后，方兰亭的革命信念更坚定了。她接替丈夫未竟的事业，每每把党的情报藏在发髻里，躲过敌人搜查，一次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。此后，她担任了四县边联委会妇女会长、县妇救会长等职。

1939年初冬，四县边联县委决定整编石邦杰部武装。经过数次研究，认为还是让方兰亭去最好。

“石邦杰是我母亲第一个干儿子。俺爹赶集卖火烧。石邦杰是个孤儿，俺爹就给他个烧饼吃。有一年，青黄不接时，石邦杰去地主家偷东西被发现，遭人围堵。天刚蒙蒙亮，俺娘在家推煎饼。石邦杰跑到俺家，让俺娘救他。后面有人喊抓贼，俺娘就明白了。俺娘让他躲在柴火里，上面又盖上席笼子。地主家的人来了，问看到小孩没有，俺娘就说朝东跑了。家丁就朝东追了去。危险过去，俺娘说孩子，我

给你些煎饼，你逃命去吧。石邦杰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，说你就是我亲娘，转身就走了。”周庆兰回忆道。

时隔五年，方兰亭家来了个小伙子，手中拿了一块布，一对白鳞片，一对点心盒子。“俺娘才认出来，之前救的小孩，成了黑黑高大的小伙子。直到组织上找俺娘谈话，她才知道，石邦杰那时候就当了专抢地主的土匪，手下有300多人，很多枪炮。”周庆兰说。

彼时，组织要求方兰亭把石邦杰瓦解过来，壮大抗日力量。方兰亭很痛快地接下了任务。“她到俺大姨家，借了大姨的衣服鞋子，打扮成富家太太，组织上又给弄头小驴，就去了。”周庆兰说。

方兰亭还来到土匪的围墙外，守卫就问她“来干什么的”。她大声说，“我是来找我儿的啊。”守卫问她找谁，她大喊“找石邦杰”，故意让石听见。正在屋里抽大烟的石邦杰听闻后，赶紧把她迎进堂屋，弄饭吃。“俺娘走走其他人，单独跟石邦杰说：邦杰，你是穷人的孩子，不能总是在外面东抢西杀的，跟共产党干才是出路。”周庆兰说。

方兰亭当时不敢透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。石邦杰也很仗义，愿听娘的话。方兰亭说：“听我的就跟我一起走。”石邦杰说，暂时不能跟你一起走。方兰亭说：“你召集一下你的弟兄们，去东盘石沟找我。三天以后，如果你不去，那你就不是听娘的话。”

方兰亭回家后，告诉东盘石沟村长：这三天不管谁来找我，你不要害怕。不出所料，第二天拂晓时，村外来了好多人。打更的看到了，速报村长和方兰亭。当时村南的场院里，好多人扛着枪。“俺娘上了村里的城楼，是邦杰来了吗？对方回答是。俺娘说，你们把枪放在离人三步的地方，人靠在城楼根，我找人去给你们弄饭吃。俺娘赶紧找到村里人，准备煎饼、豆腐、粉皮、白菜、萝卜，开始做饭，好不热闹。”周庆兰介绍道。

第二天，在方兰亭的带领下，石邦杰率部奔赴115师，壮大了抗日力量。“石邦杰打仗有勇有谋，只可惜在1940年打枣庄时，被叛徒出卖，抓起来活埋了。”周庆兰说。

吃水不忘挖井人

“俺娘还有一个干儿子，是115师的连长周宝荣。他大高个子，黑黑的，骑着大马，跟我母亲接头。我母亲问他家是哪里的，他说家是山西的。我母亲还买了一亩地，给他买了派克钢笔，教育他要学习，以后胜利了，必须有文化。后来，又把我父亲当年下东北买的被面，给他套了一床被。周宝荣跟我母亲说：娘，革命胜利了，我不让你吃一粒粗粮，光让你喝面

条吃馒头。后来打枣庄，他也牺牲了。”周庆兰惋惜道。

在东盘石沟村西的马家庄，记者见到了93岁的宋继友。他是抗战时方兰亭动员入党的，如今虽有些糊涂，但提起“周会长”，还会竖起大拇指，颤颤巍巍说起来：“我那时候很危险，是俺村唯一一个党员。周会长常跟我说，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别害怕。我有一年咳嗽吐血，托人在东北买了两块虎骨，跟黑色的蜂窝一样，专门治这个病。她身体也不好，我给她一块儿，她舍不得用，给了八路军。这人还在世不，是不是得100多岁了。”

后勤保障犹如战争这台绞杀机的加油站。1939年，大汉奸王洪九贴出布告，要抓负责四县边联后勤的周会长，悬赏50块现大洋。“我三叔找到俺娘，劝她投降，50块现大洋能买好多地呢。俺娘大骂他一顿，说他引狼入室。她说，我是小车不歪，使劲朝前推，小车就是共产党，只要共产党不倒，我就继续朝前推。”周庆兰回忆道。

战争年代，处处危险。1940年冬初，方兰亭想回家看看，还没坐下，村子就让维持会包围了。“隔壁邻居说，你赶紧跑。俺娘就翻到俺三叔家石榴树下，又翻到俺大姑家，最后翻到恶霸家的后院里。恶霸家跟维持会关系很好，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，维持会一直没进恶霸家。俺娘藏在草底下，一夜未睡。天还不亮，就翻墙跑出来了。”周庆兰说。

1939年12月28日，以115师民运部干部何波为团长的边区工作团，在官里庄召开大会，成立农民抗日自卫团。考虑到统战需要，工作团特派员邀请国民党费县县长李长胜到会讲话。

李长胜到场后，提出先把枪架起来再开会，为了表示我党的诚意，何波同意自卫队员架枪。李长胜指责农抗会和自卫团开会是非的，说“我是你们的父母官”，“年龄不大，57了”（当时李26岁，所谓五十七，是因为他是国民党57军委任的县长）“民众都得孝敬父母官，你们为什么不给我送钱粮？”

话音刚落，保安队开始收缴自卫团武器。自卫团人员全部席地而坐，又远离武器，发现上当后，想拿枪自卫。李长胜把扬起的手臂一落，身边警卫的匣子枪齐响，坐在最前排的自卫队员邱玉温等6人应声倒地，当场牺牲，殷红的鲜血从胸口流出来。

“那天阴天，俺娘带妇女去开会。她警惕性很高，听到李长胜开始说胡话，就悄悄带妇女撤出会场。刚走到河边，就听到会场里枪响了。妇女就开始跑，一个也没有受伤。后来她组织为牺牲同志的家属请愿。1964年，我母亲病危，李长胜还不承认“官里庄惨案”，俺娘还说要跟他去对质。”周庆兰回忆道。

贺礼献给妇救会

“俺娘虽然没有文化，但口才很好，记忆力也好。开会传达报告，她能一字不差。她在动委会当妇女会长，老百姓都喊她‘周会长’。后来，调到费县，都称她‘周大娘’，我以为是她的名字呢。”周庆兰说。

在1940年4月1日，第134期《大众日报》上，有一篇周大娘的演讲稿，题目为《我们带来了大会什么样的贺礼》。

周大娘所说的“大会”，指的是1940年3月10日至19日，在青驼寺召开的“鲁南妇联代表大会”。当时，大鲁南区妇女救国会成立，汪瑜任会长，方兰亭是常务委员，还任联络部部长。

方兰亭脱稿发言，讲述会前半个月前的主要工作：“第一，我们组织了六个村庄的妇救会；第二，我们作了动员青年参军的工作；第三，发起了向官里庄遭难同志家属的募捐运动。”她还分别详细叙述了工作是如何开展的，遇到何种困难。

她最后说：“以上三件工作，我们小组不但切实执行了，并把这个号召传到了全乡的妇救会去，在半月内我们就召开了两次检讨会，来讨论和检讨工作，到我来参加大会止，我们的工作才算告了一段落。我们算胜利地把贺礼贡献给了大会！”

后来又成立鲁南妇女救国总会，主要工作是发展党组织，培养干部，组织妇女开展学习，改善妇女生活，掩护伤员，送信报，抓汉奸，促进后方生产等。“我记事的时候，俺娘就带着我去山洞里，给伤员端屎端尿，送鸡蛋，烙油饼，烧点盐水，帮伤员擦洗。”周庆兰回忆道。

敌后的工作是艰苦的。尤其在严寒的天气，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，在广阔的操场上，朦胧的气色中，战士们排了一列很长的队伍。在队长的口令下开始跑步。一跑就是半点钟。但他们从没有怕冷或畏缩。

早操后，大家都到河边洗脸，这是照例的，不论下雪或河里已结了一层浮冰，也不论男女，都是一样每天都来锻炼一次。洗脸时，在河岸上拉成很长的一列，太阳光照射在每个人红润的脸上。

“那时候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不用老百姓家里的水。俺娘说，女同志穿着灯笼裤，搓搓手，捧起河水洗脸。俺娘开玩笑地问同志们，你们冷不冷呀。同志们说，不冷。俺娘说，不冷你们哆嗦啥呀！”周庆兰笑道。

1940年以后，猖狂的日军经常对沂蒙山根据地扫荡。当时，根据地动委会反复进行反“扫荡”动员教育，还进行了夜间紧急集合快速行军等一系列演习，同时动员群众埋藏粮食。方兰亭的工作任务在艰难中日益加重。

她也数次在扫荡中突围。“有一次，在白山上打仗，她说部队打光了，她装着牺牲了，等敌人撤退后，她才下山。”方兰亭的侄子，今年95岁的方敬胡说。

“俺娘说，她有一次脚腕扭着了，寄养在老百姓家。她请老乡请来推拿的郎中给复位一下。那时候的条件太差了，郎中把她的脚放在门槛底下，使劲一别，俺娘眼一花，昏过去。在那待了四五天，稍微好一点，又出发了。”周庆兰说。

典女换谷子，

做小米稀饭给战士吃

“俺娘偶尔找比较安全的时间，把我接到她身边，待上一两天。怕影响工作，又把我送回去。俺娘嘱咐我说，你要看鬼子的维持会来了，就低下头，不要盯着人家看。我从小到大，住过十几家人家。”幼时的周庆兰被磨练出超强的适应能力。

1940年冬，四县边联县遭受灾荒。国民党军队、日本兵和汉奸到处抢劫，人民生活极其困难。八路军不忍加重人民负担，各部队只得吃糠咽菜。因此干部战士个个面黄肌瘦。身为妇女会长、民运科长的方兰亭，心急如焚。

当时方兰亭住在长新桥一带，家里住着115师后方司令部的一个班，军民亲如一家。当她看到年轻的战士每次打仗回来，没有粮食，只得吃糠咽菜时，心里难受。可是到哪里去弄粮食呢？

“我那时候两岁多，俺娘看到这些小战士没饭吃，就打听到长新桥有一家人很富有，但是没孩子，就把我抱到她家，要了20斤谷子。回家轧好谷子，做好小米稀饭，给战士们吃。”彼时的周庆兰，还以为自己又换了一家寄养。

等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喝着小米稀饭时，老成的班长问：“周大娘，这么冷的天，您从哪里弄来的粮食？”方兰亭强笑着说：“大娘出去借的，下来谷子还给人家就是。”

喝了顿顿小米稀饭后，班长发现，平时逗着玩的小兰妹妹不见了，就问方兰亭，孩子去哪了？方兰亭心中难过，回答道：“别多问了。”

“班长追问，看到俺娘的表情不对，他大概知道了情况，去周围村里问，谁家刚添了个两三岁的小姑娘。等弄明白之后，他向战士们说明实情，战士们抱头痛哭。大伙儿把身上的零钱凑起来，去把我换了回来。俺娘也阻拦不住，被战士们的真情感动地掉下眼泪。”每提及此，周庆兰还是心酸。

建国后，方兰亭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。“那时候我们搬到费县民主街住。每到她发工资的时候，俺家里坐满了人，帮助过她、掩护过她、给她提供过情报的都来找她。她把她们迎到家里，乡亲们没吃没穿，她就给钱。她每季留三五件衣服，其他的全都送人了。她对生活非常知足。1964年，她去世后，我看她的存款，只有两块四毛钱。”周庆兰回忆道。

■ 责任编辑 郭爱凤